

# 试论沈从文创作中的现实精神

王文捷

(广东商学院人文系,广东广州 510320)

**摘要:**沈从文的创作关注着湘西及都市民众生存的现实状况、生命形式和精神维度,于苦难的社会人事的描绘中渗透出对人生急切的变革和坚韧的抗争精神。他在客观性现实探求中融合了理想与梦幻的精神模式,创造出文本特殊的心灵真实而给予现实人类生命意义上温暖的情感性慰藉;对现实理性的救赎包涵着作家对人类特殊的责任、宽厚的博爱和永恒的理想精神的追求,其作品在“完美的真实”里呈现出深远现代意识的自由信念。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现实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3-0055-07

现实精神往往被认定为是与历史的需要最为契合的主潮性文学精神。主动地承担社会和历史的职责而关怀“现世”与“现实”,在文学中给予现实人们以理性救赎和情感抚慰的创作意识,是贯穿风云纷乱的20世纪文学突出的创作特点之一。对于沈从文而言,“一切都要从实生活里取证”[1](493页)是其创作的一种态度和方法,在他的审美意识及其作品里,现实内容呈现出独特表现形态和深远的文化精神,承载了文学对客观现世性历史要求的深刻意义。

沈从文创作的建构和展开可以看成是其生命活动与意识的延伸。作为一个在战火频仍苦难岁月的社会底层飘泊过的作家,其创作中的现实内

容紧密贯接和沟通着他早期的奇特经历和生活情态。面对具有复杂历史背景并不断降临灾难的湘西,沈从文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那些“琐细平凡人事的得失哀乐”,长期与世隔绝的社会面临被“来自外部的某种巨大势能所摧毁”的严峻状况,许多普通人们即使是最卑微的生活“也不易维持下去”[2](85页)。这使沈从文无法避免地产生“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在隐忧之中他广泛而深入地体味到湘西人们穷困的生活状态,由此进一步触及一个个迷茫无助的民生之灵。那些在“民族人生观”上显得“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的民众灵魂,“在历史发生的坏影响”之下不断“受到报应”,其仍然继续糊涂愚昧下去的“悲惨场面”[3](321页),使他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因而关注社会现实与批判现实,深入追寻湘西社会弊病及其原因必然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内容。

沈从文的写作笔触实实在在地落到被遗忘的

湘西现实与历史存在。于是我们首先透过社会生活表面的喧嚣烟尘,看到了湘西地区因历代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的长期的闭塞和落后,民族不和与军阀混战的严重后果便是湘西社会的不安定和野蛮残暴的杀戮。作家在《怀化镇》、《清乡所见》中暴露了统治者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地捕杀和处决苗民的行径,其任意荼毒生灵草菅人命的罪恶令人发指。《湘行散记》中同样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围剿和迫害革命者的不人道行为,严峻的政治现实使昔日的湘西发生了令人痛感哀戚和隐忧的变化。这部表面清灵的散文里许多文章叙述了那里的农夫、水手、矿工、寡妇、妓女等不同深处赤贫的人类状态,他们呻吟挣扎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并不断丧失生命的天真而走向堕落。因而如《丈夫》里出现丈夫无奈亲眼触目妻子卖淫的现象也是无法避免的。沈从文还特别写到了普通妇女的悲剧性命运。《辰溪的煤》中记载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受辱自尽身亡的惨剧,而其生活环境的人却麻木得视而不见。而《湘西·凤凰》中更展示了湘西女性受到极度压抑的种种变态行为,人神恋、自我恋等方式衰弱和消亡了她们如花的生命。而小说《肖肖》中也叙说了—一个发生在无知蒙昧的乡村童养媳妇身上的悲惨故事。沈从文将中国最窒息人性又最野蛮和黑暗的传统与现实的表象揭示出来,提出了一系列的现实性乃至是历史性的问题。湘西生命在无知与穷困乃至旧传统文化的包围中发生种种异变是必然的事实。透过湘西恒久不变“美丽而忧愁”的山水与湘西历史现实风云变化的潮汐,作家通过对—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不断指涉我们民族的巨大悲剧。

沈从文对这种悲剧的展示和抚摸不断凸现了确证个体生命自觉的意义,从而对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出路加以关注和忧虑。在“让命运处置得合理—些”的个人强烈愿望的支配下,他在覆没—切历史的表象下不断反思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关注和呵护民族人类生命的精神维度。民族“在长长的一堆日子里”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原有的“纯朴范型”,在内战、毒物、饥馑和水灾等长期折磨下生命是如何走向堕落与灭亡,这些“难于设想的模式”使作家在孤独的思索中

“常备有一种悲悯感”[2](89页)。当沈从文怀着希望的憧憬和美好纯净的人生观从湘西走向城市,所及之处仍旧呈现着—片民族衰败和道德沦丧的精神图景。沈从文于是只能满怀了匡正和改造的热情,试图用文学创作唤起人们—个“新的人格—的自觉”,从而把民族个体的力量“渗入社会”,以修正“社会制度”和民族“生活观念”的错误[3](322页),进而增加他们在忧患岁月中抵抗精神衰退的生命“活力”。

所以,沈从文创作视野扩大到了关心现代都市文化和人类在历史变动中的状态,从社会生活完整性的角度同时注意到现代人类精神发展的困境。在他都市题材小说的现实描绘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迷惘和异化。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生活实在而严肃的叙述中,现代人的基本价值和意义已经消亡殆尽,现代人分裂的精神世界与人类生活本身的愿望背道而驰,人类生命应有的和谐与本真已经在“黑暗的镜子里”丧失,现代社会的许多“空心人”的生活道德观念失去了归宿感、根基感和“神性”感。这些状况对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而言是始料不及的,因而其后他不断探求民族在整体意义上的变革良方,以至于民族昔日的社会风范所蕴含的精神荣耀都成为他深深思索的问题。在那些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处,湘西人生命本身的崇高尊严正好可以弥补现代年轻人精神营养的不足,这便自然成为作家在写作中表达民族复兴希望和振作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

沈从文由此从中国文化乃至文学的背景里,从文学本体内部的精神内涵的思索中,找到了当时已成明日黄花支撑和滋养生命的人类本体意义。湘西人生活在困苦不堪中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是沈从文看到的新希望。《箱子岩》里—再颂扬了乡村民众不向命运屈服和妥协,个个奋勇当先的“划龙船”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改变生活现状和方向并重新安排新生活与创造新历史的契机。《五个军官和—个煤矿工人》描绘了煤矿工人同统治者抗争的壮举。《虎雏再遇记》、《柏子》也用生命活力的保存来激起对生命和人性意义的自恋。而《赤魔》、《雪晴》、《黑夜》、《早上———堆土和—个兵》等小说更是张扬了崇高生命的壮

烈意义和生命意志的振奋精神。即或是在《渔》这样描写充满恐怖的部落厮杀械斗的小说里,作家在血腥和残酷场面的竭力描绘中也渗透出一种崇尚勇武雄强精神的含义。沈从文在湘西历史文化和道德的某个层面之上,明确地表达出重振民族理想和信仰的变革意识。我们分明看到了作家在20世纪无言哀戚的现实世界里,所做出的种种有益的“不合适宜”的现实探求。

尽管沈从文的文化观念在当时缺乏根本性的感召力,但其自身生命的现实探索精神与力量使他产生了无穷的创造力。沈从文的创作总是冷静而从容地叙述了在深远历史背景下的湘西社会存在的种种一切,并在客观立场上传达出生命本身所应有的不断更新、振奋和抗争现实的高贵品性。他并不盲目地跟从当时现实主义某种“原则”理论的时尚,反而认为“一切理论毫无裨益于伟大作品的产生”[4](318页),转而注重具体明确的生活与生命的“现象”,从生活现实这本“大书”中去获取知识和创作的源泉,“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5](39页)。这种细致入微的现实描绘,使湘西独特、浓厚的乡土地方色彩和准确无误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融合,以隐喻的方式让客观的人事充满了生命的情绪和感觉,并造就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在具体的写法上,沈从文在其作品中刻意描写湘西乃至都市社会日常的生活,不受任何约束地对环境、行为和语言做出生动的记录,使其作品成为真正敏感时代生活变迁的“生活的切片”[6](56页)。

## 二

虽然沈从文赞同“生活的切片”那样的社会客观性现实描绘,但他认为这种纯粹客观的作品并不能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由和规律,更无法表达与体现生活乃至生命的崇高价值本相和规范,文学作品还应当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由‘斗争’求‘完美’的一种理想”[7](34页)。如果说作家应兼具现实话语诠释者和人类未来命运预言者的双重角色,应为世界提供进步灯塔的启明意义而加入现实世界的话,那么沈从文对现实的描绘

实际上是“毫无限制采取人类各种生活,制作成所要制作的形式”[7](34页),在其笔下便出现了符合“人性”并充满温情和关爱的梦幻般的生活情状,以缓释人们所面临的特殊的精神冲突和生活难题。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审美的还原,它表达了行走于现实泥土的人们内心飞翔的理想愿望。

如果简单地把沈从文笔下的理想生活情态理解为一种浪漫空想,显然是无法完全涵盖其创作的深刻意义的。生活与生命作为美的显现,本也要求作家创作中“在描写人生之苦痛”的同时表现“其解脱之道”,以使人们在“桎梏之世界中”而“得其暂时之平和”[8](751页)。这必使作家在描述生活与生命的同时,在创造性的自由言说里开辟发生在人与世界里的丰富幻象。《边城》、《长河》在生活现实的沉郁情调和人类心灵潜在“隐痛”的氛围里,呈现了人们希望实现的符合“人性”的“加入牧歌情调”的生活方式,在沉重的现实中编织出心灵本真的生活梦幻。它渗透了人类力图摆脱人性压抑而获得愉快生存的力量之后的生命理想。尽管两篇小说意义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在民族边地那些山居乡民温润的生活情形里,生命活动中那些美好思绪或传统文化的关爱意义得到了充分表现。作家对本真的生活文明的再造带给了我们一种精神上的现实,因而《连长》、《会明》等军事题材小说也以人物生命灵魂的博爱情怀去渗透军队特有的气息,即或是在具有狄更斯风格的关注城市居民贫困肮脏生活的《泥涂》、《腐烂》等小说里,也深含着作家对都市下层民众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的悲悯和怜惜。作家在一个生存的物质世界里同时呈现了现实介入和精神抚慰的双重含义。

需要强调的是,沈从文是在写实外观和情绪膨胀的表现形式下,对人们作出精神抚慰并主要指向生命个体存在和自我实现意义,其意义的选择也离开了固定的价值尺度和先验的模式。他在平常人所不能察觉的日常事件随处呈现出来的理想映照中,在其火热的心灵和情绪里同时拥有了对生命的歌吟。在生命的意义上,沈从文一直认为人类应该“活到这个世界里有所爱”,并且“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是生命应有的一种“德性”,他永远对其“崇拜和倾心”

并以此来指导写作,从而表现出成果对这个道德“幻影”的努力,以颂扬一切与他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9](34页)。这种用“美与爱”改造后的理想生活与生命模式,其中显示出的是其内心召唤的某种精神模式与理想姿态对现实的致命力量。

我们看到,这种现实模式的意义已经有别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镜子”意义,“为人生”的创作在沈从文笔下已不再是“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10](295页)。在重经验重证据的客观现实考察基础上,其“追求‘知识’”和审视现实的目的已是“实证‘个人理想’”[11](326页)。这种理想对于沈从文而言,“时间尚可决定一切”的理念使他固执地认为,作家的写作应在“人类文化史的进步意义”上进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理想和“流俗的趣味”是“不易完全一致的”。他们创作的“手和心”应该“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地接触世界”,因而对现实的表现同样也应该“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12](160页)。于是,沈从文这种“永久性”进步意义在洞察时代之时表现了清醒和自信而抵达了人性的深处,对现实的开掘聚焦到对民众生命意义中作为情感性慰藉的理想意蕴。

作家在现实描绘中注入生命的理想意义使现实精神呈现出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往往使作家自身生命的意义和力量也得到扩张和提升。在沈从文的观念里,一切作品的写作都是“需要个性”且都必须浸透作家的“人格和感情”[13](42页)。纷纭的历史记忆和繁复的生活表象必须指向对生命情绪的理解和抚慰,作家笔下深广的现实在创作中需要重新破解和确立。因而对于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个颇费踌躇的问题,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反映现实的“真”视为“诚”的话,那么沈从文则认为文学表现尤其是现实表现则“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作家的人格精神和崇高情感才是至关重要的方面,对客观现实的描绘要的只是“恰当”这个概念[14](114页)。如果在对现实的创作中过分地扩大写实的意义,便会引起作家想象世界的衰退而让经验世界拘束了心智,尤其是使“思想不同”的作家受到限制而

无从在自由的情形下写作,文学的自由表现就可能受到种种毫无意义的压抑。

由此看来,沈从文推崇的现实表现是一个带有心灵自由想象的现实的重构。其自身精神的苦痛和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使《边城》和《长河》,包括那些湘西色彩浓郁的其他小说与散文的“真实”,在其特殊语言叙述的“边城世界”里具有多重的结构意义。表达现实生活的象征性意旨和寻找崇高的精神指向,使他认为对现实的表现应只看“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如果“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即使《边城》中那种现实世界已经消失了,也同样可以表现。即或是写了根本没有的现实世界“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13](45页),现实创作最重要的是做到“诚实的自白”和“精巧的说谎”的统一[7](34页),创作文本的终极意义只存在于自由开放的“阅读或理解”。沈从文已把客观历史与现实“真实”的扭力让位给了历史与现实“叙事”的魅力。他以自我经验敏感的触须以及个人的言说建立了创作的虚构,打破了真实和虚构二元意义的对立。因而即或是在都市生活小说里,他也是在冷峭之中表达着自我对都市现实独特眩奇的感受,在“文体实验”的表象下显示了对现实生活独创的洞见。

沈从文的这种新的创作可能性实现了他对写作传统的反动。它重新呼唤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声音的倾听,湘西现实语境在表现人类卑微、挣扎、渴望、无奈的同时还表现了生命应有的温暖、惊奇和喜悦。如果文学从本质意义而言的确只是为了表达作者某种“热忱健康的人生观”,或者传递有历史价值和长远意义的“真理和热情”[15](134页),那么作家在边城那些平民、老兵、水手、青年甚至于那些地方首脑人物的身上和生活中,“抓定”了那些“最美丽与最调合的风度”,让健康的人生形式与作家对生活的热情融合在一起,在温柔悲悯的抒情风味里逼视人类爱的情感并体验心灵对生命的亲近,于其精神探险的向度上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创作传统。那些趋近神话和浪漫的力量不仅是湘西人拯救自己生活的方式,也是民族或人类在现实中寻找的超越现实的最基本的文化价值之一。因而即或是在《长

河》这样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再现湘西“常与变”的力作里,我们虽然感触到了作家对现实古怪莫测、人生多解的叹息,但其中不变的人性和显得抽象的崇高道德标准仍表明,作者一直都在“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3](45页)。

### 三

如果说文化精神的构筑是人类用来超越俗定的现实而进行意义追寻的手段,从而确定人自身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文化救赎正是沈从文走向现实人生世界的路标,也成为其不断探索的动力和根源。在其自主、诚实而深度地探索湘西生活与生命的意义之时,作家的主体精神品格使他的现实描绘较为准确地体现了湘西人生存的矛盾、痛苦和向往的丰富性、深刻性。沈从文抛开了批评家们关注的所谓“人生观”和“世界观”,其创作主体意识穿越湘西世象而提示出人类存在的某种意味深长的情状,实质上达到了对现实与人生理性审视这一更为重要深远的一面。在理性地关心和认识中国现代社会变化之后,沈从文从理想的“真与美”视野角度注视到了文学与人类生存间存在的永久性文化关系,对这种真美和善美关系的承诺和守望也显示出其现实精神已进入文学审美深层的根柢。

基于湘西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沈从文主体的现实精神包涵着对完善这种生存状态的特殊责任感。在《新与旧》、《传奇不奇》等小说里作家叙述了大兵和乡民因蒙昧而毁灭的惨痛故事,呼唤对现代灵魂的开启以及对理性与文明的渴求。而《三三》里写城市青年下乡养病,“山里水流”最终“流向城里”,也象征了现代文明和自然文化的互补与融合,这是对人类社会逃避异化从而踏上健康发展的途径的探寻。人类的现代理性与原初自然意义的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完美意义,也代表了对人性意义中终极性的自由精神追求。在“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事实”[16](324页)的情况下,只有“凭知识和理性”才有可能得到“日趋于合理”的人生[17](100页),因而其创作以明智的“智者”意识和博大理

性的情感力量,承担了对湘西民众生存命运的深切关怀,并对人类那些丑行恶德做出了批判和向善的引导。沈从文坚信《湘西》、《湘行散记》乃至许多湘西题材小说在给予人们怀古幽情、苦笑乃至恶梦的同时,“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信心”[18](226页)。其对地方人情的铺陈翻检着历史和现实的风云,折射出作家对未来湘西的变革与走向的关注。引导湘西人觉悟而勇敢地从事于民族复兴的大业,正是作家所极力思考的问题和勇敢承担的责任。

沈从文创作主体这种理性的关注蕴含着对人类宽厚的博爱情怀。作为一个沟通湘西人类情感独特的本土作家,沈从文“天性就对于一切活的人皆能发生尊敬与同情”[19](316页),总是以文学家特有的个性化的方式,崇高的情操和健康的感情,对于艰难生存的湘西人类给予力戒偏见和浅薄的真诚与挚爱。那些“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的山水草木地方风情,无不在泥土味和人性味中显示出作家对其独特的深厚情感。沈从文认为他“对这个世界有所爱”,因而无论是《边城》世界中年青人、爷爷、老马兵、水手等所有人物的悲喜哀乐,还是在《牛》中宽厚仁慈的牛伯,《连长》里的部队军官,甚至《肖肖》中那些有些愚昧的家人身上,都注入了厚朴、绵长而温暖的关爱。即或在湘西令人惊骇的妇女“行巫”、“放蛊”、“沉潭”和“落洞”等带有疯狂色彩的世象和刑罚里,在平和舒缓的普通人的只言片语与行为之中,乃至那些麻木而愚昧的乡民的悲惨命运里,作家在其独树一帜的“爱与美”原则里对此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其现象层面的细节生成与深层次抽象内涵中的博爱精神相交织,使他避免了把生活作为时下意识形态背景的“工具”意义阐释。

如果说文学作品确实可以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沈从文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一个推进历史走向光明的“理想的工具”[20](64页)。从创作客体即现实生活本身这个角度而言,沈从文对这种工具意义的追寻使其作品在描绘的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里,蕴含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股潜在永恒的精神力量。他在湘西人生活与生命里努力寻找人类生命的“神

性”,作为人类灵魂的探险和漫游也成为通往人类灵魂理想的幸福通道。湘西人生存状态不仅是对循环往复的人类生存、悲哀与苦难进行解说和阐述,边城人生形式充满力量的优美诗意也同样给予人类某种未来价值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因为边城生活已成为高洁灵魂、优美人性与自然生命一个博大而完美的载体。而《龙朱》、《雨后》等纯美而清新的民族传说和生活叙事,明确地体现着作家对生活 and 生命的自由理想性意义的理解与期待。如果说人类历史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黑暗到光明变迁的话,那么体现这种发展趋势的人类精神力量也必然是由丑恶不断趋向完美而达自由。从《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到《边城》、《长河》乃至《柏子》等情节迥然相异的篇章里,从封建道德、变态心理与乡村质朴情怀朴实民风的对比中,作者试图用下层人民保留的健康、纯洁、充满活力的道德原则救治虚伪、怯懦和自私的民族老化症。作家通过“给自己与他人以把握得住的共通的人性达到交流的满足”[20](64页),从文化心理结构意义上“形成一种向前进取的勇气和信心”,从而在“觉得历史有了错误”之时“去努力修改历史,创造历史”,以达到“向人类光明努力”[21](26页)的目的,体现了极富生命力的历史文化理想精神的基本命脉。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固执在这种文化理想精神里独步前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深邃的现代意识来观照现实人生的。他坚信一个作家“若不能逃脱个人爱憎与社会流行毁誉”,想成为伟大作家是“实无希望可言”,而其作品展示了

“对真理或未来社会有所倾心”的信条。他认为鼓励作家创作的应当是“对生存的责任或兴趣”,刺激作家的应该是“全体人类全体幸福与快乐”,批评作家的应当是“现在未来的一切读者”[22](40页),应当把现实生活的创作放入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加以审视与思考。这种高远开阔的现代视野和对社会的过去历史、现在情状与未来期待的深远认识,不被外在的既定观念和阶段性时尚所左右,从而超越了现实尘嚣的功利而获得了创作的心灵自由与本真,并不断显露隐藏在人类内心的真善美品质,在文化理想的光芒中映照出了人本存在的意义、精神与价值。

由此我们发现沈从文这种现代意识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蕴。这种意识在对湘西人们充满博爱激情与关心的至尊精神的同时,还指向了人类长远发展与存在的未来意味。他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性眼光已注视到“全体人类”,在生存的广阔背景和历史的文化渊源中审视生活中应有和不应有的一切,对人和人社会最终的“幸福和快乐”作出意味深长的探询,使历史流程里的边城现实生活形态描绘避免了狭隘与浮浅,也使其作品深层次里渗透着的理想精神不是所谓“光明”尾巴或对明天的廉价颂歌,而是基于立足现实的一种强健的理性人格精神,以及对人类永恒的真善美之境的自由信念。他把人本的美好道德情怀和对其持久的渴望贯穿于对世俗的描绘中,在现实生活某种“完美的真实”重构中呈现出抗争和超越现实的奇特魅力。

#### 参考文献:

- [1]转引自:凌宇.沈从文小说选:第2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2]散文选译·序[A].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3]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A].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4]致《文艺》读者[A].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5]《幽僻的陈庄》题记[A].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6]转引自:(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社会和文化[M].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7]新废邮存底·十[A].沈从文文集:第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8]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郭绍虞,罗泽根.中国近代文论选: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9]《篱下集》题记[A].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0]水云[M].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1]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A].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2]一个传奇的本事[A].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3]《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4]短篇小说[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5]小说与社会[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6]知识阶级与进步[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7]绿魇[M].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18]《边城》题记[A]. 沈从文选集:第5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19]给某教授[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20]沉默[M].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21]新废邮存底·七[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22]新废邮存底·十二[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Attempt at Realism in Shen Congwen's Creation

WANG Wen-jie

(Humanities Department, Guangdo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shows solicitude for actual state, life form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West Hunan populace's existence in his creation and reveals anxiety for life change and perseverance in struggle in his description of hardships of social and human affairs. In his search for objective reality, he fuses spiritual patterns of ideal and illusion, creates special and real souls and thus produces warm affection and comfort of actual life meaning. His special duty to the man, his universal love and eternal pursuit of ideal spirit are embodied in the salvation and redemption of realistic reason, while his works' "perfect reality" presents free idea of far-reaching moder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literary creation; realism

[责任编辑:唐 普]